

外省人的台語經驗初探： 一個半結構式訪談研究*

許慧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台灣的「外省人」常被認為不會講台語。但從許多外省人的自述、統計資料、戶籍法的規定，或是和外省人較有接觸的中老年人的經驗來看，許多中年以上的外省人不但會講台語，甚至還是台語母語者。本研究針對不同年齡層的外省人，進行半結構式訪談。訪談問題如下：1. 台語的主要習得來源；2. 對台語的看法；3. 國語運動的經驗；4. 是否曾因講台語而受到正面效益或回饋。結果顯示，早期的外省人從環境中習得台語，且台語當時仍相當有活力，因此其台語能力大多相當優良。隨著本外省人的通婚普遍，母系成了 1961-1970 年出生的外省人最普遍的台語習得來源。不過，從 1971-1980 年世代開始，環境再度成為外省人習得台語的主要來源，但環境中的台語活力已逐漸流失。至於對台語的態度，則是從 1970 年世代開始，功能性轉為認同性。華語在 1970 年代已更為普及，且這個世代正好遇上台灣企業的西進中國潮，台語成為在中國的台灣人社群語言。另外，當年的「國語運動」雖對本省族群衝擊很大，但對外省族群來說，受訪者幾乎都沒有很具體的印象，甚至無感。對於使用台語是否曾有正面回饋，受訪者也幾乎皆表示無感。

關鍵詞：外省人、台語、台語習得、語言態度

* 本文內容主要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台語作為曾經的共同語——外省人的台語」(MOST 108-2410-H-003-049-) 的研究成果。在此要感謝科技部的支持，也要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對本文初稿所提出的寶貴建議。

1. 前言

在台灣，外省人常被認為不會講台語。在目前華語強勢的社會中，這個印象似乎更為明顯。外省族群公眾人物會講台語，或是台語形象鮮明的外省人，常成為新聞標題甚至是話題。前者的新聞標題常會出現「『秀』台語」，¹後者則容易出現「卻」、「居然」等等有逆轉功能的用詞，²這些標題也反映出「外省人應該不會講台語」這個刻板印象。

這個印象，可能是受早年省籍意識、中國國族主義、「國語運動」等，這幾乎同時實施又相互影響所致。其實，外省人並非台語絕緣體，畢竟在「國語運動」推行初期，台語依然是台灣民間最主流的語言，甚至是許多外省第二代的母語之一。但是，卻少有以外省人台語為主題的相關研究和調查。

除此之外，解嚴之後，「外省人」族群及認同，從法律和社會層面開始逐漸淡化。1992年，戶籍法修正，取消「籍貫」制度，改為登記「出生地」。且台灣主體意識逐漸形成，年輕世代可說已沒有本省／外省的觀念。但是，台語的流失並未隨解嚴而趨緩，華語依然維持優勢地位。

在上述的情況下，本研究定位為外省人台語相關研究的初探，期待從外省人的台語經驗出發，開始記錄並探索外省人的台語。

2. 名詞解釋³

2.1 外省人

本研究對外省人的定義如下：「二次大戰之後至 1951 年，自中國移居來台的民眾，及其至 1992 年之前出生之後代。」

¹ 三立新聞. 2022.11.24.〈本土台派代表性人物！曹興誠秀“流利台語”呼籲民眾別被統戰，創立粉專大談抗中保台，強調為了捍衛主權會繼續寫下去〉。取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7JKEeBHvfw>（查詢日期：2023.08.15）。

² ETtoday 新聞雲. 2020.05.26.〈吳朋奉「外省人卻說流利台語」！原因有洋蔥：喜歡就是喜歡〉。取自：<https://star.ettoday.net/news/1722847>（查詢日期：2023.08.14）。

³ 在此必須說明，本文有關族群與語言的所有詞彙，如本省人、外省人、台語，皆出於考量討論時的簡潔與該詞彙在使用上的普遍性，並無任何排擠之意。

針對本定義提及的兩個年分，1951 年及 1992 年，簡短說明如下。國共內戰帶來的移民潮，是台灣近代史上最大的移民潮。這波移民潮於 1951 年左右結束（王甫昌 1994: 53），因此本研究將 1951 年訂為外省人移入台灣的年代上限。⁴此外，本定義將 1992 年設為本研究中外省人的最後出生年，是因為台灣在 1992 年修正戶籍法，將個人本籍的登記，由「父親之本籍」為原則改為「本人出生地」。⁵

台灣社會對外省人經常以世代分類，故有外省第一代、外省第二代等類別。雖然這種分類方式確實反映了大部分的現狀，但難免會失真。如，在中國出生，由成年父母帶來台灣的年幼子女，和外省第一代一樣是在中國出生，但成長環境和經驗又較接近外省第二代。此外，外省第一代因為當年的社會狀況，以及以軍人為主要的部分族群，受到婚姻限制，結婚年齡差異很大，也因此外省第二代目前的年齡差異也相當大。

因此，本研究對受訪者不以世代分類，而是以出生年分類，以反映出該時代的社會狀況。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設定的外省人出生年分，在目前台灣社會中，大部分皆為在台出生的外省人第二代及少部分的第三代，僅有少數是在中國出生，幼年或襁褓時期即隨父母來台者。

2.2 本省人

本省人是指至遲於台灣的日治時期即已長期居住於台灣的漢人及其後代，包括台語族群以及客語族群，其中台語族群占多數。本研究所指稱的本省人，只包括台語族群，也就是王甫昌（1994）所指稱的「本省閩南人」。

2.3 第一代

本研究在資料收集及分析上不以世代作為分類標準。但在討論社會現象

⁴ 許慧如（2014）將外省人由中國移至台灣的年代定義為二次戰後，但這個定義並不充分，因為無法排除在台灣解嚴後和中國交流後來自中國的移民。這類中國移民，目前在台灣一般歸類為新住民，與外省人不同。

⁵ 修正前的戶籍法，亦規範了幾種非以父親本籍的狀況，但非本文重點，且大多數籍貫認定直接根據父親本籍，因此在此不再贅述。

時，還是會使用到世代的概念。

本研究的「第一代」，是從外省人族群開始定義的，並參考王甫昌（1994, 2001），將外省第一代定義為 1950 年之前出生的外省人，其同儕本省人則稱為「本省第一代」。其實「本省第一代」一詞，也反映了相當程度的現實社會狀況，因為有了「外省人」才有「本省人」。

2.4 第二代

本研究的「第二代」，也是以外省人的定義出發。外省第二代，是外省第一代在台灣出生的子女。至於本省第二代，就是外省第二代的同儕本省人。

外省第二代可能父母雙方皆為外省人，也可能只有其中一方為外省人。其中最常見的狀況是，父親為外省人，母親為本省人，其中本省人又以台語族群為主。本文所提及之本省人的通婚，也僅聚焦於台語族群的本省人。

2.5 華語

本研究所稱的華語，就是英文的「Mandarin」一詞，也常稱為「中文」。台灣過去的「國語運動」所推行的語言，就是華語，而中國的普通話也是華語。因此許多台灣人向來並未區分「華語」跟「國語」二詞的差異，而且「國語」才是更常用的詞彙。

但是，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考量，「國語」一詞並非語言的名稱，並帶有社會意涵，呈現該語言的地位（status）。且一國的國語可能改變，也可能不只一種語言。因此，本研究在中性指稱「Mandarin」這個語言時，會使用「華語」一詞。

2.6 國語

本研究中，若提及和「國語運動」直接相關，或是有關華語在台灣的社会意涵（如標準語、高階語言等）時，就會使用「國語」一詞。

3. 研究背景

3.1 外省人常被認為不會講台語

早年，外省人可以說是和「中國人認同」以及「標準國語」這兩個形象畫上等號。何萬順（2009）就曾提及，在早年的社會環境中，「……無論本省或外省，民眾一般的認知就是外省族群說的話都是『國語』。」（何萬順 2009: 376）這很可能是因為「省籍區分」、「戒嚴時期」、「國語運動」這些政策推動的時間，幾乎是重疊的。畢竟這幾項政策可說是環環相扣的，因此時間上的重疊其實並非巧合。當然，在各種政策和宣導的效果下，外省人的中國人認同較本省人明顯，外省第二代的華語更是一般人心目中的標準國語。⁶許慧如（2019）的研究結果就顯示，即使是解嚴之後才出生的年輕世代，對於外省第二代口音的華語，在各方面的評價，都還是相當高，甚至都高過堪稱台灣主流口音的台灣華語（Taiwan Mandarin）。

在「國語運動」雷厲風行的年代，大約就是台灣的戒嚴時期，台灣社會經歷了華語的集體第二語言習得（“group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Winford 2003: 231）。值得注意的是，「國語運動」要推行的不只是國語，還強調是「標準國語」；帶有台語口音的「台灣國語」正是「國語運動」積極消除的口音。華語和台語在語言政策上的對立，再加上政治和社會制度的影響，產生了「外省人－標準國語」、「本省人－台語→台灣國語」這兩個對比的連結。

但是，這個連結簡化了當時的語言狀況。外省人，尤其是早年在台灣成長或在台灣出生的外省人，和台語的關係不但不疏遠，甚至可能是母語人的程度。

3.2 許多外省人其實也會講台語

外省第一代的母語大多不是華語，但許多人是以前華語為溝通語言。且由於大批外省人於二次大戰及國共內戰後隨國民政府移入台灣，在離散、懷鄉

⁶ 外省第一代的母語各不相同，中國各種方言都有，許多人是以前華語（也就是當時政策下的國語）作為溝通的語言，因此有所謂南腔北調；但這些南腔北調的華語，到了第二代則相當程度等化了（leveled），發展出外省口音的華語（Hsu & Tse 2009）。

等共同生活經驗，以及部分政治制度的規定下，逐漸形成「外省人」族群。加上外部的國語推行運動及中國國族認同政策的影響，華語可說很快地就成為外省第二代的母語。且如前所述，外省華語也普遍被認為是標準國語。

但是，外省人講標準國語，並不表示外省人不會講台語。只是，早年的政治氣氛，使得外省人的台語能力常常被忽略。當前的台灣，華語早已全面普及，在年輕世代之間也已無省籍隔閡，且外省人特徵最為明顯的第一代也多已凋零。因此年輕族群對於外省人的想像很容易簡化為「眷村伯伯」、「不會講台語」等印象。

其實，早年的外省人雖有相當比例來自眷村，但也有許多各行各業的人，並非成長於眷村。且雖然有眷村，甚至早年曾經有明顯的省籍情結，但台灣從未實施過任何的族群／種族隔離政策，即使是在眷村成長的外省人，和本省人接觸的機會也很多，且隨著年齡增長而增加，如求學、上班、日常事務等。

此外，由中國來台的第一代外省人當中，有許多來自福建。根據 1956 年進行的「中華民國 45 年臺閩地區戶口普查」的統計結果，籍貫為福建的外省人達外省族群的 15%。其中應不乏來自泉州、漳州、廈門等地者。如已故兒童文學作家、國語日報社前社長，林良，就是來自福建廈門的外省第一代。來自這些地區的外省人，其母語和台語相通，較易融入台灣民眾，外省人身分也不易外顯。

簡言之，外省人的台語經驗絕對無法簡化為「外省人不會講台語」。畢竟，大約至 1987 年解嚴時，即使學校、媒體、官方早已幾乎全面以華語運作，在民間，台語依然是最有活力的語言。甚至許多外省第一代民眾，也至少有一些生活對話程度的台語能力。其實，對目前台灣許多壯年以及老年人（在解嚴前就已是成年人者）來說，會講台語的外省人其實並不罕見。

3.3 會說台語的外省第一代

王甫昌（1994）分析了 1991 年「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的結果，在語言能力方面顯示，外省第一代（1950 年之前出生者）有 39.7%能夠使用

「流利的」台語。該文也引用了簡漢生（1988）分析行政院研考會從 1978-1986 年進行的七次大型民調中的語言調查結果，以及中央研究院「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於 1991 年 2 月的調查結果。前者關於語言能力的選項共有六個，分別是「非常流利、流利、可以交談、會聽一部分、會聽不會說、完全不懂」。後者的選項雖稍微不同，但相當接近，大抵也是從「流利」到「完全聽不懂」分為六個等級。

分析結果顯示，外省人的台語能力，⁷若只考量「非常流利」與「相當流利」這兩個最高的選項，比例從 1978 年的 18.8% 提升到 1991 年的 51.5%。如果再增加第三個選項「可以交談」，比例則是從 1978 年的 49.6% 增加到 1991 年的 75.5%。這些比例，甚至可能高過現在的台語族群家庭中的年輕人。⁸

本文作者幼時生活在台北市城中區，附近多為政府機關，除了有許多軍公教人員之外，也有許多經商做小生意的外省第一代民眾，包括當年極具特色的重慶南路書報攤。這些老闆經常跟本省客人以台語進行買賣交易，當地的傳統市場中，也常見到外省人以台語買菜。當然，這些外省第一代的台語能力可能和其生活經驗有關，許多也可能僅有生活會話的能力。

3.4 會說台語的外省第二代

至於外省第二代，王甫昌（1994）的分析結果顯示，外省第二代的受訪者當中，有 58.7% 表示自己能夠流利地使用台語。這個世代的外省人，接觸台語的背景較第一代多元，除了透過生活中與本省同儕的互動而自然習得之外，也有許多是本省外省通婚的子女，同時是華台雙母語者。

3.4.1 以台語為母語之一的外省第二代⁹

⁷ 王甫昌（1994）引用的資料，並未針對受訪外省人的世代或年齡進行分類。

⁸ 即，家中長輩皆為台語族群者。這些年輕人大多出生於解嚴後，台灣社會往華語的語言變遷（language shift towards Mandarin）已堪稱完成的時代。這個時代出生的台灣人，幾乎都是以華語為第一語言，且已沒有本省外省的口音差異（許慧如 2014）。

⁹ 外省第二代以華語為母語，這對大多數外省第二代來說都不是典型的母語傳承，而是社

雖然許多外省第二代也以台語為母語，但這一點卻容易被忽略。這要從外省人的通婚狀況和戶籍法的規定兩個角度看起。

(1) 外省本省的通婚狀況

台語有一個詞「芋仔番薯」，指的是外省人和本省人通婚所生的子女，這個詞就反映出外省本省通婚是相當普遍的事情。除了從語言的角度側面推測之外，更有直接相關的學術研究。

王甫昌就曾經發表過多篇關於台灣的族群通婚之相關論文（如，王甫昌 1994, 2001, 2005）。這些研究提到，外省第一代的男性和女性的比例有明顯的差距，男性人數約為女性的三倍。在這個不均衡的性別結構下，外省男性和本省女性通婚是必然的結果。¹⁰

王甫昌（1994）指出，第一代外省人男性中有 47.7%和本省閩南人結婚，12.1%則是和本省客家人結婚。此外，王甫昌（2001）分析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在 1998-1999 年之間所執行的「台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調查研究」的面訪資料，資料顯示，外省人的父母，通婚比例一直增加，從當年 60 歲以上（1939 年以前出生）世代的 10.3%，一路增加到 30-39 歲（1960 年代出生）62.6%。20-29 歲組（1970 年代出生）也有 57%。

(2) 外省人的身分認定忽略母系

這些外省人與本省人通婚的子女，雖然母親為本省人，但依照過去的法令及當時的社會氣氛，在族群分類上屬於外省人。

台灣在 1992 年修正戶籍法，將個人本籍的登記，由「父親之本籍」改為「本人出生地」。舉例來說，若 A 君於 1981 年出生於嘉義縣，A 父於 1953 年出生於新竹縣，A 祖父於 1928 年出生於中國山東省，依照修正前的戶籍法，A 君及 A 父，即使在台灣出生成長，甚至未曾去過中國，他們的「本籍」依然是山東省。A 君及 A 父不但在制度上是山東人，甚至也會自稱山東人。但戶籍法於 1992 年修正之後，將本籍註記改為出生地註記，A 君及 A

會語言結果。不過這並非本研究之主題，因此在此不加贅述。

¹⁰ 外省女性則大多內婚，也就是和外省男性結婚。另外，第一代外省男性亦有相當比例終生未婚。由於這並非本文主題，因此不再深入探討。

父的戶籍資料及身分證上，就不再是「本籍」山東，而是「出生地」新竹縣、嘉義縣。

在 1945-1992 年將近五十年的時間中，父母籍貫不同者，其籍貫就是父親的籍貫。在這段時間，身分證上的籍貫為中國各省市的「外省人」第二代，其中有一半以上的母親都是台語母語者。

母親多為子女的主要照顧者，在早年的社會尤其為是，因此子女在語言上受到母親的影響是相當普遍的。除此之外，外省第一代男性大多單身來台，因此這些外省—本省通婚下的外省第二代，在生活中較缺乏父方的親戚網路。且外省第一代有相當高的比例為軍人，許多因勤務的關係鮮少在家，因此，通婚下的外省第二代通常和母方的家族系統往來較密切(王甫昌 2001)，更強化了其來自母方語言的能力。在目前討論的情況中，這個母方語言，就是台語。¹¹

新北市前市長朱立倫就是一例。朱立倫曾經在《國語日報》的報導中提及他的台語經驗：

我從小在桃園八德的鄉下長大，我的父親是外省人，而母親則是本省人。我父親是軍人，小時候，他因為出任務常不在家，所以我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在母親的娘家度過。由於從小都用台語跟長輩說話，台語也因此成了我的母語。¹²

3.4.2 透過與本省人互動而習得台語的外省第二代

即使是雙親都是外省人的外省第二代或是幼年隨家長一起來台的外省人，即使家中沒有台語環境，在和同儕朋友的互動中還是很有機會學會台語。畢竟當年在台灣的社會中，台語還是民間最主流的語言，客家人、外省人也有相當高的比例會講台語。王甫昌(1994)分析的資料就顯示，客家人能說流利台語的比例也和外省人幾乎一樣。外省人第一代及第二代的比例分別為

¹¹ 當然可能有部分本省人母親未和子女講台語。

¹² 國語日報(網頁版). 2016.01.11.〈朱立倫：人生就像棒球 每一場都要全力以赴〉。取自：http://www.mdnkids.com/Mdn_Celebrity/20160111.shtml (查詢日期：2017.12.09)。

39.7%及 58.7%，客家人則為 39.7%及 54.3%。而客語則主要還是客家族群的語言（表一）。

表一 本省閩南、本省客家、外省語言使用能力的狀態（按世代分組）¹³

	第一代	第二代	全部	顯著性
一、能流利使用國語的百分比				
本省閩南	29.8	59.0	47.6	.000
本省客家	44.8	79.0	64.7	.000
外省人	79.4	89.4	85.6	.072
二、能夠使用流利的閩南語百分比				
本省閩南	92.3	91.8	92.0	.762
本省客家	39.7	54.3	48.2	.088
外省人	39.7	58.7	51.5	0.17
三、能夠使用流利的客語百分比				
本省閩南	1.2	1.8	1.6	.403
本省客家	91.4	77.8	83.5	.033
外省人	1.6	4.8	3.6	.278

資料來源：「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1991年2月調查資料。

以眷村為例，雖然眷村是一般被認為最封閉的外省人社區，但也不是沒有台語環境。眷村內也有本省人，其中又以本省媽媽最多。台中市前市長胡志強就曾撰文描寫其童年的眷村生活：

村中，本省的『番薯』和外省的『芋仔』生活在一塊，沒有隔閡。我們平時都玩在一塊兒……毫無語言溝通的問題；吵架時也會以閩南語互罵……雖然外省籍的成年人不太會講閩南語，但小孩子在學校或村里玩在一起，久而久之，閩南語多能朗朗

¹³ 本文表一為王甫昌（1994）之表十重製。

上口。¹⁴

除此之外，早年許多外省人，在成長過程中，還會透過在學校和同學的互動、在社區中和其他同儕的互動，自然學會台語。曾獲得金馬獎最佳男配角、金鐘獎迷你劇集最佳男主角的已故演員吳朋奉，也是外省第二代，在中央社的一次專訪中提及他幼年時的台語經驗：「台語就是兒時最常聽見的語言，散布在生活周遭，從學校同學到街坊鄰居，『哪有可能不講台語』。」¹⁵

外省人在服兵役時期的台語經驗，也時有所聞。楊允言在《台灣語文運動：訪談記史料彙編》一書的序言中就提到，「畢業後入伍，抽到上上籤，在南竿，部隊裡的『外省人』也講台語，環境所逼，一切顯得那麼自然。」(p. VI)¹⁶

3.5 外省人可能感受的台語優勢

綜合以上背景，整體來說，在「國語運動」期間，大約也就是台灣的戒嚴時期，在客觀環境上，外省人多被視為標準國語使用者，其華語也大多沒有台灣國語的問題，因此也比較不會如其同儕本省人一般，有學習「標準國語」的壓力。另一方面，在他們成長的年代中，台灣民間的台語生命力仍然相當旺盛，他們的台語能力很可能也讓他們在生活中各個面向得到更多的便利。

換句話說，本省人在「國語運動」推行過程中，一方面要努力學標準國語，另一方面，又因為母語為台語，以台語為主要語言，而有不少負面的經驗，如講台語被罰、台灣國語口音被嘲笑、考試因會錯意而失利等等。曾有初中聯考作文題目為「火車頭」。「火車頭」一詞在華語的意思是帶領火車的第一節車廂，並常作為領導力量的比喻。但是台語的「火車頭」指的是火車

¹⁴ 榮民文化網：<http://lov.vac.gov.tw/village/Content.aspx?i=1&c=1>（查詢日期：2017.12.09）。

¹⁵ 中央通訊社. 2018.07.05. 〈就是愛：吳朋奉回不了頭的台語思戀〉。取自：
<https://www.cna.com.tw/culture/article/20180705w002>（查詢日期：2023.08.23）。

¹⁶ 楊允言、張學謙、呂美親. 2008. 《台灣語文運動：訪談記史料彙編》。台北：國史館。

站。這種誤解，在重要的聯考作文上就會造成嚴重的失分。¹⁷相對於此，外省人不但沒有學國語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為身為外省人「卻」有台語能力，反而有正面的經驗。但是，在華語已經全面普及的今天，外省人的台語能力和台語經驗，幾乎都被忽略了。

4. 研究方法

4.1 半結構式訪談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研究人員事前設計問題綱要，而非封閉式的問題或選擇題。由於外省人的台語相關的研究和紀錄較少，採用半結構式訪談，較可兼顧訪談內容的質與量。研究人員與受訪者皆有較大的空間可發揮。研究人員可適時引導，讓訪談過程更為流暢，受訪者也較可暢所欲言。

本研究有四個訪談問題綱要，如下：

訪題 1. 台語的主要習得來源。

訪題 2. 對台語的看法。

訪題 3. 「國語運動」的經驗。

訪題 4. 是否曾因為講台語而感受到正面效益或回饋。

4.2 受訪者條件及招募方式

本研究的訪談對象為「會說台語的外省人」。其中，對「外省人」的定義如本文 2.1 小節所述，為「二次大戰之後至 1951 年，自中國移民來台的民眾，及其至 1992 年之前出生之後代」。至於「會說台語」，這個條件較不易定義。由於長期以來，台語還是以口說層面為主，文字書寫並不普及。¹⁸且從國語推行運動之後，台語使用的場合逐漸限縮小為私領域中的一般日常對話為主。因此本研究對「會說台語」這個條件的期待，是能以台語流暢進

¹⁷ 管仁健 (2014)。

¹⁸ 我國教育部自 2006 年公告台羅拼音開始，已進行許多台語文字化的工程，台文書寫逐漸推廣中。但本主題非本文重點，在此省略。

行日常對話與生活經驗的描述。

至於受訪者的台語能力是否符合本研究的要求，本研究設計了兩個條件。第一，受訪者自評；第二，研究人員在訪談前會再次確認受訪者的台語能力。第一個條件，乍看之下似乎並不嚴謹，但在台灣目前以華語為主流的環境中，即使中年以下台語家庭出身者，都未必有自信能以台語接受訪談。若有自認會說台語且為外省人者，應該多為確實能以台語與人互動者，且還有上述第二個條件為受訪者的台語能力把關。實際操作之後顯示，這兩個條件堪稱恰當。本研究招募到的所有外省人受訪者皆能以台語順利完成訪談，受訪者主要透過研究團隊的人際網絡，以及受訪者的人脈尋得。

4.3 受訪者人數

受訪者根據出生年分成以下四組：

表二 受訪者根據出生年之分組及各組人數

	出生年	人數	男	女
第一組	1939-1960	14	8	6
第二組	1961-1970	16	8	8
第三組	1971-1980	16	8	8
第四組	1981-1992	10	5	5
總計		56	29	27

5. 資料分析及結果

所有訪題皆為開放式問題，研究人員並未提供任何選項或引導。訪談完成後，研究人員再根據所有受訪者的回答內容進行分類。本節呈現各訪題的分析結果，相關的討論則於第 6 節呈現。

5.1 台語習得主要來源

本研究根據訪談內容，將受訪者主要的台語習得來源整理成以下 8 類（表三）：

- (1) 母系：母親為講台語的本省人。受訪者的主要台語習得來源為母親，或是母親的原生家庭以及家族成員，如外婆、阿姨等。
- (2) 日常生活：家庭、學校、工作、當兵以外的日常生活，包括和鄰居、友人的互動，也包括和陌生人的短暫互動，如購物、參加活動等。非直接互動中接觸到台語，如媒體、交通工具廣播、聽到其他人的交談等等也歸為此類。
- (3) 工作：開始就業後因工作接觸而習得台語。
- (4) 同學：中學以後因為求學離開眷村，在學校跟同學接觸，開始習得台語。
- (5) 當兵：服兵役在軍中和同袍接觸，開始習得台語。
- (6) 中國工作：在中國工作時，台灣人之間溝通而習得。
- (7) 父母：主要的台語習得來源為父母。這點和(1)「母系」不同。「母系」指的是都來自母親及其家族，因父親為外省人。而此項目的「父母」指的是，父親或／和母親及其家族。
- (8) 通婚：受訪者本人因為和講台語的本省人結婚，配偶家族使用台語。

表三 「台語習得來源」人數統計結果

	出生年				總計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1939-1960	1961-1970	1971-1980	1981-1992	
1. 母系	0	10	7	2	19
2. 日常生活	5	0	4	4	14
3. 工作	7	2	1	1	10
4. 同學	0	3	2	1	6
5. 當兵	1	1	0	0	2
6. 中國工作	0	0	2	0	2
7. 父母	0	0	0	2	2
8. 通婚	1	0	0	0	1
總計	14	16	16	10	56

5.2 對台語的看法

本研究根據訪談內容，將受訪者對台語主要的態度整理成以下 7 類（表四）：

- (1) 台語是方言：受訪者具體指出台語就是方言，且多半還會伴隨「國語」比較重要、國際化，或是台語就是應該在家學。
- (2) 可以拉近距離。
- (3) 多一種語言很好。¹⁹
- (4) 俚語俗語詩詞。受訪者對台語最直接的印象，是台語的俚語俗語很

¹⁹ 有些受訪者提到「多一種語言很好」，但後續會提到可以增進與台語人的溝通和人際關係，這類說法，在本研究會歸為「拉近距離」。但受訪者若僅從語言學習的角度來看，將台語視為眾多非母語之一，則本研究會將之歸類為「多一種語言很好」。且這類受訪者多半會講多種漢語方言，除了華語跟台語之外，還能講自己父母的母語，如上海話、浙江話、四川話、山東話等。

豐富生動，²⁰或是用台語唸古典詩詞很好聽。

- (5) 認同：包括文化以及國族認同。文化認同主要為台語和台灣的文化連結，如「台語是台灣的母語」。國族認同則是將台語作為台灣人的連結，如「台灣人應該要會講台語」。但從訪談內容難以區分文化認同和國族認同，且這相當程度上似乎也反映了目前大環境的現狀。因此本研究並未再區分文化認同或國族認同。
- (6) 過去被打壓。
- (7) 有特別的「氣口 (khui-kháu)」。

表四 本研究受訪者對於台語的主要看法整理與人數統計

	出生年				總計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1939-1960	1961-1970	1971-1980	1981-1992	
1. 認同	2	0	5	8	15
2. 拉近距離	0	12	0	0	12
3. 多一種語言很好	7	0	5	0	12
4. 方言	4	2	1	0	7
5. 俚語俗語詩詞	1	0	3	0	4
6. 過去被打壓	0	0	1	1	2
7. 有特別氣口	0	0	0	1	1
8. 其他（無、未答）	0	2	1	0	3
總計	14	16	16	10	56

5.3 對「國語運動」的印象

說到當年的國語運動，學生在學校講母語遭到处罰，大概是現在六十歲

²⁰ 其實，俚語俗語並非台語特有，而是所有有活力的自然語言都會發展出的具文化特色的表達方式之一。

以上許多台灣民眾的共同記憶了。這樣的印象，可以形成這麼大規模的共同記憶，是因為當時大部分的學童，母語都是台灣本土語言，且生活中幾乎沒有華語。

不過外省族群對於「國語運動」的印象，似乎很少被提及。以下是本研究受訪者對於「國語運動」的主要印象分析。表五整理出各年齡層受訪者對「國語運動」的各種印象的人數。

表五 本研究各年齡層受訪者對於「國語運動」各種主要印象的人數分布

	出生年				總計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1939-1960	1961-1970	1971-1980	1981-1992	
1. 有，但無感	7	7	6	1	21
2. 未經歷	2	1	7	9	19
3. 不嚴厲	1	5	1	0	7
4. 沒印象	2	1	2	0	5
5. 有，印象差	1	1	0	0	2
6. 有，支持	1	0	0	0	1
7. 未答	0	1	0	0	1
總計	14	16	16	10	56

5.4 講台語是否獲得正面效益

至於最後一個訪題，「是否曾因為講台語而感受到正面效益或回饋」，只有 1981-1992 年組的受訪者表示，工作上遇到客人很稱讚她會講台語。但也無法判斷是因為她是外省人，還是因為她是年輕人。至於其他受訪者皆未表示有具體的相關印象，亦表示未曾有具體感受。

5.5 客家外省家庭中的台語

本研究的受訪者中，有一位受訪者本人為客家家庭的女婿，還有 6 位來

自外省和客家的通婚家庭，包括 1961-1970 年組的 2 位，以及 1971-1980 年組的 4 位。

上述這幾位受訪者皆台語流利。外省人和本省台語人通婚的子女，會說台語，甚至以台語為母語，並不令人意外。但是，父母是外省／客家通婚，依然能說流利的台語，相當程度上就說明了台語的共通語地位。這 6 位受訪者，有 5 位都不是在家中習得台語的，其中有 3 位甚至是成長於眷村或以外省人為主的環境中。另外 1 位則表示，其母親及母系家庭雖為客家人，但在家中都說台語。該受訪者表示，幼時在台東外婆家，母系家庭都說台語，因為左右鄰居以及生活中都是台語（表六）。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計畫有一位 1944 年在上海出生、1948 年隨父母來台的受訪者，妻子為本省客家人。這位受訪者表示，他的岳父母皆為客家人，但他和岳父母的溝通語言為台語。雙方雖皆非台語族群，但台語都是母語者的程度。

表六 1961-1970 年及 1971-1980 年組母親為客家人之受訪者的台語習得主要來源

年齡組	人數	成長環境	台語習得主要來源
1961-1970	2	一般	母系
		眷村	學校
1971-1980	4	一般	生活
		一般	生活
		外省人多	中國工作
		眷村	中國工作

6. 討論

前小節呈現的研究結果中，出現了幾個值得進一步觀察的重點或趨勢。首先，本文 5.1 小節整理出 8 種習得台語的來源，若將這 8 種來源，根據公

私領域 (domain) 分類，可分為「家庭」和「環境」兩大類 (表七)。這兩大類來源，顯示了世代差異，再加上幾個特定世代才有的習得來源，都反映了華台語消長及部分社會現象。除此之外，對台語的態度以及台語的流利程度，也呈現了對應性以及世代差異。本小節將詳細討論。

表七 本研究受訪者的台語習得來源，依「家庭」及「環境」分類

		出生年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1939-1960	1961-1970	1971-1980	1981-1992
家庭	母系	0	10	7	2
	父母	0	0	0	2
	通婚	1	0	0	0
總計		1 (23%)	10 (63.5%)	7 (44%)	4 (40%)
環境	日常生活	5	0	4	4
	工作	7	2	1	1
	同學	0	3	2	1
	當兵	1	1	0	0
	中國工作	0	0	2	0
總計		13 (77%)	6 (36.5%)	9 (56%)	6 (60%)

6.1 由環境習得台語的特定世代

本研究的第一組受訪者，幾乎皆是從環境中習得台語的。其中僅有一位習得來源是家庭，但也非來自原生家庭，而是成人之後因為與本省人配偶結婚而接觸的姻親家庭。這一組受訪者的習得來源幾乎皆為「日常生活」或「工作」。我們進一步分析之後發現，受訪者是否成長於眷村，和這兩個習得來源是有關連的。

由日常生活習得的 5 位受訪者當中，有 4 位的生活環境是和本省人混

居，兒時玩伴大多是台語使用者。另一位雖是在公教宿舍區成長（但不是眷村），但小學同學皆為台語母語人。值得注意的是，這 5 位受訪者，都是這個組別中年齡較大者。其中 4 位是在中國大陸出生後，嬰幼兒時期隨家人於 1949 年隨國民政府遷至台灣。另一位是在二次戰後到政府遷台前，在台灣出生。

前外交部長蔣孝嚴，也曾經在一則專訪中提及其 1949 年隨家中長輩從中國大陸移居新竹的生活：

那段時間，左鄰右舍都是本省籍同胞。我們是唯一從大陸來、在當地開起舖子的外省人。那時候一般大陸來的，不是住在眷村，就是住在所謂的宿舍區，極少在商業街定居。……我一進入新竹東門國小就念三年級，而我在大陸一年級都還沒念完。初入東門，國語不會，台語也不懂。……但在學國語的同時，我台語也學會了。因為班上絕大部分都是本省籍的同學。²¹

至於在「工作」中習得台語的 7 位第一組受訪者，皆在眷村長大。當時為國民政府遷台初期，外省和本省的通婚還不普遍，因此這些受訪者的家中及其眷村生活中，幾乎接觸不到台語。他們都是 1970 年代開始就業之後，才有機會密切接觸台語。可見至少到 1970 年代，台語還是台灣民間最主要的語言，外省人的原生家庭雖然幾乎沒有台語，但是進入一般群體中，還是需要用到台語。

6.2 透過母系親友習得台語的世代

第二組受訪者，也就是俗稱的「五年級生」，最主要的台語習得來源是家庭。16 位受訪者中就有 10 位的習得來源是家庭，且全都是來自母親及母方的親人。至於第三組受訪者，也就是俗稱的「六年級生」，雖然來自家庭的台語習得來源比例降低，但是 7 位在家庭領域中習得台語的受訪者，習得

²¹ 遠見編輯部. 1988. 〈章孝嚴首次親述童年、成長、抱負〉。《遠見雜誌》1988.04。取自：<https://www.gvm.com.tw/article/769>（查詢日期：2023.05.09）。

來源也全都是母系。

這兩組外省人所屬的年齡層，可說都是外省第二代，其中有很大比例的父母是外省人和本省人通婚。本研究的 1961-1970 年組的 16 位受訪者中，就有 14 位來自父親外省母親本省的通婚家庭，其中 12 位的母親為台語族群，另外 2 位為客家人。至於 1971-1980 年組的 16 位受訪者中，也有 13 位來自父親外省母親本省的通婚家庭，其中 9 位為本省閩南人，另外 4 位為客家人。

王甫昌（2001）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外省第二代有相當大的比例，父母是外省本省通婚。根據該研究的資料，1960 年代出生的外省人受訪者當中，有 62.6% 的母親為本省閩南人，15.1% 為本省客家人。1970 年代出生的外省受訪者，則有 57% 的母親為本省閩南人，11% 為本省客家人。

在傳統社會中，母親多為子女的主要照顧者，加上第一代外省男性許多皆單身來台，還有許多人因勤務關係較少在家，其子女和母方家族往來密切的狀況可說相當普遍，因此自幼也習得了台語。²²這個狀況也反映在本次的研究結果中。

6.3 「環境」再度成為外省人習得台語的主要來源

一般來說，家庭是語言流失的最後一道防線。但是，對外省人家庭而言，家庭反而可能是台語流失的第一關。

雖然 1960-1970 年、1970-1980 年這兩個年齡層的外省人有相當大的比例，是自幼從母系家族習得台語，為台語母語者。不過，這兩個年齡層正好成長於「國語運動」強力推行的年代，加上外省人背景和華語的連結，「國語運動」在家庭的效果，早在 1960-1970 年出生的這個世代就逐漸顯現出來了。本研究第二組共有 14 位受訪者來自外省父親本省母親的通婚家庭，但僅有 10 位由家庭中習得台語，其他 4 位的家庭語言已經是以華語，這 4 位當中有 1 位客家人、3 位台語母語人。

此外，從第二組到第四組受訪者的台語習得來源，「家庭」來源持續弱

²² 見本文 3.4 小節。

化，從第二組到第三組之間，「家庭」來源所占的比例，就減少了幾乎 20%。除此之外，在「家庭」這個大分類中的習得來源，也有世代差異。第四組受訪者，也就是俗稱的「七年級生」，以家庭為習得來源者，不但人數比例降低，母系的比例也大幅降低，並且增加了「父母」這個來源。²³七年級生的成長環境中，華語早已透過教育、媒體，取得強勢地位。他們的父母輩，求學期間正是「國語運動」最積極推行的時間，即使是以台語為母語的本省人，也都已習得華語，並且長期以華語求學、工作、生活主要語言（之一）。加上受訪者的外省背景，其父母即使本身為流利的華語／台語雙語人，和子女以華語為主要語言並不令人意外。

外省人越來越難以從家庭習得台語。外在環境的台語雖然也因「國語運動」逐漸流失，但台語畢竟是大部分台灣人的母語，也是台灣實質上的共通語。如本文 3.3、3.4 小節所描述，這個情形持續到至少 1990 年代。

過去幾個關於台灣語言環境與語言使用的統計數據都顯示，台灣在長期且全面獨推華語的「國語運動」影響之下，台語和其他本土語言的活力流失。但是，大約在 1970 年代中期之前出生的台灣人，仍有堪稱流利的台語能力，台語和華語的能力最為接近，之後台語活力流失和華語活力上升的程度就出現交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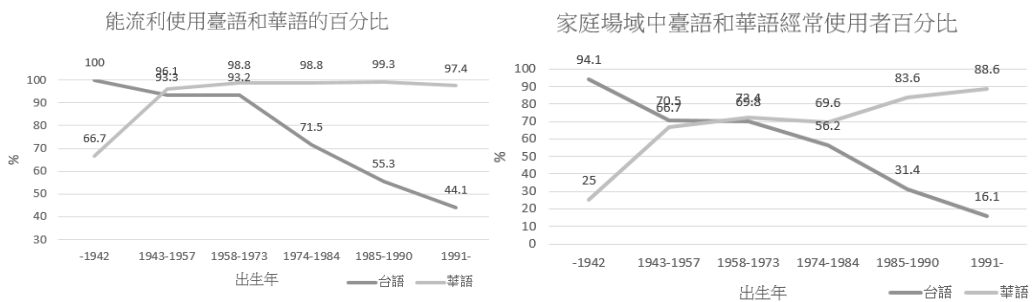
葉高華（2017）分析了 2013 年台灣社會變遷調查中關於語言的幾個問題的統計資料，其中有兩個關於受訪者出生世代和家庭語言的統計結果，值得進一步探討。第一個問題是受訪者在家中最常講的語言，第二個問題是受訪者最希望小孩跟他使用的語言。統計結果都顯示，台語和華語的使用程度，在 1966-1975 年這個年齡層最為接近，並且和前一個年齡層（1956-1965 年出生者）有明顯的差距。在下一個年齡層，也就是 1976-1985 年出生這個年齡層開始，華語的使用已超越台語（圖一）。

²³ 這點和「母系」不同。「母系」指的是都來自母親及其家族，因父親為外省人。而此項目的「父母」指的是，父親或／和母親及其家族（見 5.1 小節）。



圖一 2013 年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出生世代與家庭語言的交叉分析

陳淑嬌 (2007) 在全國各地進行語言使用的調查，調查對象涵蓋了六個年齡層、七種職業別、三種教育程度，已有全面性普查的規模。該研究中關於台語和華語的調查結果也顯示，台語和華語的活力，在 1974-1984 年出生的這個世代出現交叉。



圖二 不同世代台灣民眾的台語華語使用狀況 (資料來源：陳淑嬌 2007)²⁴

家庭可說是語言流失的最後一道防線。上述這幾個語言調查結果，都是在家庭場域 (domain) 的使用狀況，可以推測，同時期台語在其他場域的使用狀況，如工作、日常消費等，應該會略高。這樣的環境，讓逐漸無法在家庭場域中習得台語的外省人，有機會習得台語。

²⁴ 各語言分別調查，故各年齡層各語的百分比總和並非 100%。

不過，即使如此，台語的活力還是持續流失，從環境中可以習得的台語也持續減少，學習者的台語能力也降低。本研究四個年齡層的發音人，年紀較大者，訪談時以台語回應的人數比例較高。再比較第三組和第四組。這兩組受訪者從環境和家庭習得台語的比例接近（表七），第三組有 56% 受訪者是由環境中習得台語，第四組則有 60%。但是，第三組 16 位受訪者中還有 4 位是以台語受訪，而第四組 10 位受訪者中只有 1 位以台語受訪。

6.4 特定世代的習得來源

本研究觀察到兩個只出現在特定世代台語習得來源，分別是 1971-1980 年組的「中國工作」、和 1981-1992 年組的「父母」（表三）。這兩個來源也反映了這兩個世代特有的狀況。

1971-1980 年組有兩位受訪者提及中國工作經驗。兩位皆表示，在中國工作時經歷到，台灣人社群之間常用的語言是台語，有時在人多的場合中，還會為了只讓台灣人聽懂，故意捨華語講台語。這兩位受訪者是在這樣的環境下習得台語的。值得一提的是，這兩位受訪者皆為父親外省人，母親客家人，家中幾乎沒有台語環境。這顯示出，台語開始在國外發展出「台灣人」的認同指標。不過這個認同究竟是國族認同，還是社群認同，則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這個「台灣人」認同的現象以及世代，也呼應了高格孚（2004）的部分研究結果。高格孚（2004）呈現了他在 1997 年，也就是台灣解嚴後的十年，針對外省人進行的問卷調查結果。其中有一題調查受訪者的自我認同，是「外省人」、「台灣人」，抑或「兩者皆是」。結果顯示，在台灣出生、年齡層越低者，「台灣人」認同度越高，而「外省人」認同則是相反的趨勢（表八）。且 1968-1981 年出生的年齡層，「台灣人」認同開始超越「外省人」認同（高格孚 2004: 103）。不過這個「台灣人」認同未必是國家認同。該研究的另一個問題就顯示，自我認同為「台灣人」和「中國人、台灣人兩者皆是」的 75%，同時認為「中國人」和「台灣人」是「同一種族，同一民族」。

表八 高格孚（2004）「您自認為是外省人還是臺灣人？」訪題統計結果

	外省人	臺灣人	兩者皆是
大陸出生	59.4	10.1	11.6
1945-1967 年出生	45.5	27.6	10.9
1968-1981 年出生	40.7	42.9	8.2

中國工作經驗成為這個世代特有的台語習得來源，和台灣的社會狀況有關。1990 年代，台灣企業開始赴中國投資。到了 2000 年代初期，投資金額大幅增加。根據經濟部投審會的統計資料，²⁵2002 年赴中的投資金額增加為 67 億美元，較前一年的 28 億美元增加了超過一倍，並且從此維持在 60 億以上，到 2010 年代前半更是幾乎都在 100 億美金上下。1971-1980 年代出生的世代，從進入職場到中年這段期間，正好遇上這波赴中投資潮。

此外，有兩位受訪者的台語習得來源為「父母」。本研究歸類的「父母」來源，和「母系」不同。「母系」指的是都來自母親及其家族，但是此項目的「父母」指的是，父親或／和母親及其家族。這兩位受訪者，皆為 1981-1992 年出生的年齡層。這個年齡層的外省人，父母輩幾乎都是外省第二代以及其同世代的本省人，大約為 1950 年代末期到 1960 年代出生者。在這樣的背景下，1981-1992 出生的外省人，其台語的習得來源就未必是「母系」了。受訪者的外祖父母和祖父母當中，可能僅有一人是外省人，也可能僅有一人是本省人。值得一提的是，這個年齡層的人，無論是本省人或外省人幾乎都是在華語為強勢語言的環境下成長。

6.5 對台語看法的世代差異

本研究受訪者對於台語的部分看法，有兩點出現世代差異。第一，是「功能性」和「認同性」的消長。這裡所說的「功能性」，強調的是較具體的溝通功能，「認同性」強調的是文化或國族的認同層面。第二，是刻板印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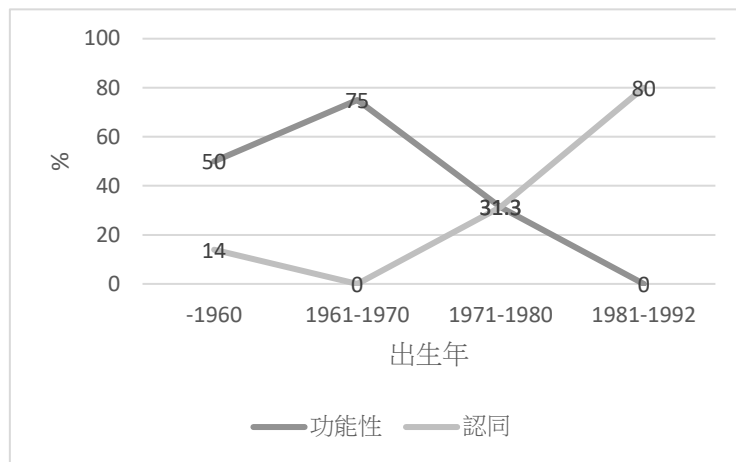
²⁵ 經濟部投審會：https://www.moeaic.gov.tw/business_category.view?lang=ch&seq=3（查詢日期：2021.01.29）。

存在與否。

受訪者對台語的看法，有兩種和功能性有關。一種是「拉近距離」，另一種是「多一種語言很好」。「拉近距離」要表達的是台語能夠增進人際關係、拉近彼此距離，因為周遭有許多人講台語。這種態度雖然帶有情感成分，但主要還是以語言溝通為出發點——因為雙方能溝通，就能拉近彼此的距離。至於，「多一種語言很好」的態度，出現在 1960 年之前出生組和 1971-1980 年組，不過這兩個年齡層對於台語作為「多一種」的語言，出發點似乎有所不同。1960 年之前出生組的受訪者當中，有三位受訪者表示除了華語、台語之外，還會講其父母的母語，包括上海話、浙江話、山東話、四川話等，顯示這些受訪者是將台語和其他中國的漢語方言相提並論。也有受訪者表示曾經住過台灣的客語區域，所以還會講客語。1971-1980 年組則是將台語視為華語之外的語言，畢竟華語是目前台灣最強勢的語言。受訪者大多提到如「什麼語言都好，多學一點都好」，甚至會具體提到英文。值得觀察的是，1981-1992 年組的受訪者，都沒有人提及這些有關功能性的態度。

至於認同面，在 1971-1980 年組開始明顯增加，到了 1981-1992 年組，更是占了大部分。且在這兩個年齡組，也都有受訪者提到台語曾經受到政策上不公平的待遇，並且主張語言都應該是平等的。這個現象，或許也反映出台灣政治環境的改變。

值得注意的是，功能性和認同性的態度，是互有消長的(圖三)，且 1971-1980 年組是轉折點，該組的功能性和認同性的比例相當。功能性的比例降低，也反映出「國語運動」的影響，因為華語逐漸普及，即使台語母語者也會講華語，當華語逐漸成為共通語，台語的功能性需求就降低了。而這個結果，和中研院 2013 年台灣社會變遷調查的結果(圖一)是吻合的。從圖一可以看到，在 1966-1975 年出生的這個世代，在家最常使用的語言，華語和台語幾乎已不相上下，之後的世代則是以華語為主要語言。且該調查的內容是「在家」的語言，而家庭可說是語言變遷(language shift)的最後一個場域(domain)。也就是說，在家庭以外的場域，如工作、交友、學校等，華語的使用情形會更普遍。



圖三 本研究外省族群對台語態度的世代走勢圖

還有一類態度，本文暫稱之為刻板印象。刻板印象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強調台語的「古典」／「優雅」，另一類是強調台語的「氣口」(khui-kháu)。若進一步觀察可以發現，刻板印象幾乎都出現在 1971-1980 和 1981-1992 年組，而這兩個年齡層無論是成長環境，或是個人的語言使用習慣，都是華語較為強勢。當大家用華語都能溝通無礙時，台語的溝通功能弱化，也容易和特定功能連結，本項目討論的刻板印象，就是這種特定功能，或許可視為另一種標籤。

6.6 「台語的主要習得來源」與「對台語的看法」的交叉分析

除了從世代差異的角度來分析受訪者的各項回應，本研究也針對受訪在訪題 1. 「台語的主要習得來源」，以及訪題 2. 「對台語的看法」，這兩個訪題的回應，進行了交叉分析(表九)。由表九可以看出，「訪題 1(來源) x 訪題 2(看法)」的交叉分析中，「母系 x 拉近距離」以及「日常生活 x 認同」，有明顯的關連。不但互為該項目中最多數的說法，且皆為該訪題中最多數的說法之一。以「母系 x 拉近距離」這個組合為例，「母系」是受訪者最多的習得來源，而以「母系」為主要台語習得來源者當中，對台語的看法最集中

於「拉近距離」。而「拉近距離」，為訪題 2 人數次高的說法，且這題表示「拉近距離」的受訪者當中，「母系」也是最多人的習得來源。

表九 本研究「台語的主要習得來源」x「對台語的看法」交叉分析

		訪題 1. 台語的主要習得來源								
		母系	日常生活	工作	同學	當兵	中國工作	父母	通婚	總計
訪題 2. 對台語的看法	認同	3	8	1	1	0	0	1	1	15
	拉近距離	9	0	1	1	1	0	0	0	12
	多一種語言很好	4	3	4	1	0	0	0	0	12
	方言	1	1	4	1	0	0	0	0	7
	俚語俗語詩詞	1	0	0	0	1	2	0	0	4
	過去被打壓	0	1	0	0	0	0	1	0	2
	有特別氣口	0	0	0	1	0	0	0	0	1
	其他（含未答）	1	0	1	1	0	0	0	0	3
	總計	19	13	11	6	2	2	2	1	56

「母系 x 拉近距離」這兩個因素的相關，或許可從社會語言學的「隱性威望（covert prestige）」來討論。社會語言學早期的幾個經典研究中，就開始出現關於隱性威望的討論。在語言社群中，常有官方或是「檯面上」的標準語，在該語言社群中帶有正面的形象，也就是具有顯性威望（overt prestige）。但是，不具有顯性威望的語言或口音，仍常有特定族群會使用。因為在該族群，不具顯性威望的這種（些）語言或口音，仍有其功能，也就是具有隱性威望（covert prestige），如親切、歸屬感等。Labov 經典的紐約百貨公司研究（Labov 1966）應是最早觀察到這個現象的研究之一，Trudgill (1972) 也觀察到類似的現象，且具體使用了 covert prestige 一詞。

台灣在國語政策積極推行的年代，從政策、資源分配等角度來看，華語

的顯性威望可說無庸置疑。以「母系」為主要台語習得來源者，是從小即在家庭中講台語的台語母語者，是流利的華台雙語母語人，同時處於來自母系的台語社群和外省人的華語社群，也可能因此更能感受到台語在華語優勢下仍有其「檯面下」的功能，「拉近距離」就是其中一種隱性優勢。

至於「日常生活 x 認同」，本研究定義為「日常生活」的習得來源，主要是生活中非常態性的接觸。屬於這一類的受訪者，不只家庭中無台語環境，連學校、當兵等較長期的活動階段也幾乎沒有台語。他們是透過生活中零碎的台語接觸，逐漸習得台語。「日常生活 x 認同」的相關，或許可以視為因接觸了台語而較為認識台灣，認同台灣。

6.7 受訪語言的世代差異

本研究在進行半結構式訪談時，並未指定受訪者使用的語言，全部由受訪者自行決定。結果也和圖一的趨勢大致呼應，年紀越長，使用台語的比例越高（表十）。不過，在此要提醒讀者，圖一呈現的是大規模隨機抽樣的統計結果，但表十統計的對象皆為外省人。

表十 本研究各年齡層受訪者受訪時使用的語言人數分布

	出生年				
	1939-1949	1950-1960	1961-1970	1971-1980	1981-1992
華語	3	5	11	12	9
台語	5	1	5	4	1

7. 結語

本研究針對不同年齡層的外省人進行了半結構式訪談，訪問的問題主要包括：1. 台語的主要習得來源；2. 對台語的看法；3. 國語運動的經驗；4. 是否曾因講台語而感受到正面效益或回饋。

研究結果顯示，大約 1960 年之前出生，並且幼童時期就在台灣成長的

外省人，是從生活環境中學習台語，當時的台語仍然相當具有語言活力（*language vitality*），因此他們的台語能力大多相當流暢，甚至沒有任何非母語口音。隨著本省人和外省人通婚的普遍性增加，母系成為 1961 年至 1970 年出生的外省人最常見的台語習得來源。然而，從 1971 年至 1980 年出生的世代開始，生活環境再次成為外省人習得台語的主要來源，但此時台語的活力已逐漸減退，在生活環境中習得的台語能力，也難以和上述早期從環境中習得台語的外省人相提並論。

就對台語的態度而言，1970 年代出生的這個年齡層開始從功能性轉變為認同性，但新的刻板印象也開始出現，如台語有特有的氣口（*khui-kháu*）、台語很古典、用台語念詩詞很優雅等。此外，這個年齡層的受訪者正好遇上台灣企業在中國的擴張潮，台語成為在中國的台灣人社群中的語言。

此外，雖然當年的「國語運動」對本省族群造成了明顯的語言衝擊，但對外省族群來說，大多數受訪者幾乎沒有具體的印象，甚至沒有感受到。對於使用台語是否曾經獲得正面回饋，受訪者也幾乎都表示沒有特別的感受。

這些研究結果顯示，「外省人不會講台語」的普遍觀點過於簡化，無法捕捉到這個族群的語言現實和經驗。外省人的台語能力、習得來源、對台語的態度等，都有多元的樣態。外省人社群內部的社會語言發展，值得進一步研究。

引用文獻

- Hsu, Hui-ju & John Kwock-ping Tse. 2009. The tonal leveling of Taiwan Mandarin: A study in Taipei. *Concentric: Studies in Linguistics* 32.2: 225-244.
- Labov, William. 1966.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r) in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Store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 Trudgill, Peter. 1972. Sex, covert prestige, and linguistic change in the urban British English of Norwich. *Language in Society* 1: 179-196.
- Winford, Donald. 2003. *An Introduction to Contact Linguistics*. Malden, MA: Blackwell.
- ETtoday 新聞雲. 2020.05.26.〈吳朋奉「外省人卻說流利台語」！原因有洋蔥：喜歡就是喜歡〉。取自：<https://star.ettoday.net/news/1722847>（查詢日期：2023.08.14）。
- 三立新聞. 2022.11.24.〈本土台派代表性人物！曹興誠秀“流利台語”呼籲民眾別被統戰，創立粉專大談抗中保台，強調為了捍衛主權會繼續寫下去〉。取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7JKEeBHvfw>（查詢日期：2023.08.15）。
- 中央通訊社. 2018.07.05.〈就是愛：吳朋奉回不了頭的台語思戀〉。取自：<https://www.cna.com.tw/culture/article/20180705w002>（查詢日期：2023.08.23）。
- 王甫昌. 1994.〈光復後台灣漢人族群通婚的原因與形式初探〉。《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6: 43-96。
- _____ . 2001.〈台灣的族群通婚與族群關係再探〉，劉兆佳、尹寶珊、李明堃、黃紹倫主編《社會轉型與文化變貌：華人社會的比較》，393-430。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
- _____ . 2005.〈由「中國省籍」到「台灣族群」：戶口普查籍別類屬轉變之分

- 析)。《台灣社會學》9: 59-117。
- 何萬順. 2009.〈語言與族群認同：從台灣外省族群的母語與台灣華語談起〉。《語言暨語言學》10.2: 375-419。
- 高格孚. 2004.《風和日暖：外省人與國家認同轉變》。台北：允晨文化。
- 許慧如. 2014.〈在族群與語言接觸下形成的台灣華語——從聲學分析的結果看起〉。《語言暨語言學》15.5: 635-661。
- _____. 2019.〈後國語運動的語言態度——台灣年輕人對五種華語口音的態度調查〉。《台灣語文研究》14.2: 217-254。
- 陳淑嬌. 2007.〈台灣語言活力研究〉，鄭錦全等編《語言文化的多元文化思考》，19-39。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國語日報（網頁版）. 2016.01.11.〈朱立倫：人生就像棒球 每一場都要全力以赴〉。取自：http://www.mdnkids.com/Mdn_Celebrity/20160111.shtml（查詢日期：2017.12.09）。
- 楊允言、張學謙、呂美親. 2008.《台灣語文運動：訪談記史料彙編》。台北：國史館。
- 經濟部投審會：https://www.moeaic.gov.tw/business_category.view?lang=ch&seq=3（查詢日期：2021.01.29）。
- 葉高華. 2017.〈台灣民眾的家庭語言選擇〉。《台灣社會學刊》62: 59-111。
- 榮民文化網：<http://lov.vac.gov.tw/village/Content.aspx?i=1&c=1>（查詢日期：2017.12.09）。
- 遠見編輯部. 1988.〈章孝嚴首次親述童年、成長、抱負〉。《遠見雜誌》1988.04。
- 取自：<https://www.gvm.com.tw/article/769>（查詢日期：2023.05.09）。
- 管仁健. 2014.〈八股文不可怕，八股心態才可怕〉。新頭殼新聞網站。取自：<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4-06-23/48548>（查詢日期：2017.12.12）。
- 簡漢生. 1988.〈為國語、閩南語、客家語三聲教育催生〉。美洲《世界日報》第七版（11月21日）。

[2023年6月15日收稿；2023年8月23日修訂；2023年9月7日接受刊登]

許慧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hsuhj@ntnu.edu.tw

Waishengren's Taiwanese Experiences: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Study

Hui-Lu KHOO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Waishengren,” meaning “Out-of-province person,” denotes those who migrated to Taiwan with the KMT after the Chinese civil war. Despite assumptions that Waishengren are non-Taiwanese speakers, evidence from surveys and the life experiences of numbers of Taiwanese suggests many are Taiwanese speakers, some nativ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Taiwanese-speaking Waishengren explored language acquisition, attitudes towards Taiwanese, Guoyu Movement experiences, and positive language encounters, aiming for nuanced insights. Results showed generational variations, with pre-1960 births acquiring fluent Taiwanese naturally. Those born 1961-1970 mainly learned from mothers due to intermarriage, while the 1971-1980 cohort, influenced by the Guoyu Movement, saw the environment as one of the main Taiwanese learning sources.

Regarding attitudes, the 1970s cohort marked a shift from communication to identity-driven focus, reflecting changing sociopolitical landscapes. Interestingly, subjects across cohorts lacked concrete impressions of Guoyu Movement experiences or whether speaking Taiwanese was positive.

Key words: Waishengren, Taiwanese learning, Taigi learning, language attitude